

亨利·A. 吉鲁，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和文化研究学者，批判教育学代表人物。在书中，吉鲁把学校理解为民主的公共领域，教师被定义为转化性知识分子，他鼓舞教师和学生为了社会的民主和公正而重构教育生活。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

——迈向批判教育学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Learning

[美] 亨利·A. 吉鲁 / 著 朱红文 / 译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Series
教育、社会与文化译丛

译丛主编 / 朱红文 劳凯声 金生鈇 阎光才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育、社会与文化译丛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Series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

——迈向批判教育学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Learning

[美] 亨利·A. 吉鲁 / 著 朱红文 /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郑豪杰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 迈向批判教育学/
(美) 吉鲁著; 朱红文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4

(教育、社会与文化译丛)

书名原文: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ISBN 978 - 7 - 5041 - 3931 - 3

I. 教… II. ①吉… ②朱… III. 教育学—研究 IV. 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783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3 - 6262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 - 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19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文籍激光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保定市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 文 版 序

中国教师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吗？

亨利·A. 吉鲁

当 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写《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之时，我并没有预料到在后来的岁月中民主可能遭到围剿的程度。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属于社会保守主义和黠武政治的时代，90 年代则有着新自由主义的烙印。新自由主义似乎要友好一些，但却同样有害，它把经济置于民主政治之上，把公司利益置于公共考量之上。随着自由主义把关心的重点转换到社会供应之上，变种为喋血的达尔文式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价值就开始屈从于市场价

值，公司利益开始形塑政府的旨趣，而不是接受政府旨趣的规范控制。市场领域之外的政治变得似乎难以想象了，这就是因为市场一心寄希望于这样一种机制，其标志就是肆无忌惮的自私自利以及与伦理考量无关的价值体系。

随着 2000 年乔治·W. 布什被选为总统，公司的地位陡然上升，开始盛气凌人地、不留一点痕迹地取代民主的王座，成为充斥社会每一个方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的核心原则。^[1]公共利益的概念以及所有社会性的事物都遭到攻击，因为它们有损获取利润的旨趣，限制了市场身份、价值和关系的扩张和可能性。因而，那些作为民主—自由、公正和平等之中心的非商业性价值，不是被忽视，就是被一种新型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看作是不相关的。这种新秩序的特征是，不再重视工业生产的旧的力量和价值，而转移到强调金融资本以及由新的知识—信息产业内的“非物质”生产所生成的财富。公民现在主要是通过被动的选择概念来界定的，买和卖构成个体和社会能动作用的意义和实质。

在这个时期，在市场力量的全球肆意攻击之下，流动性成了新的流行语，这预示着，在新的全球秩序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不变的，或安全可靠的，而所谓本体和力量必定失去稳定的外观而表现为一种根本的不确定性，屈从于似乎不受民族国家政治力量约束的市场经济的任性。随着福利国家的逐渐崩溃，一种根本性的不安全、恐惧和不确定性逐渐潜入许多人的生活中，他们开始经受越来越多的艰难和痛苦。随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经济比政治得到更多的尊重，公民被变成了一个消费者，商品的买卖似乎就是一切。

与这种由自由市场的宣传所推动着的倒行逆施相反，《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试图把从贺拉斯·曼（Horace Mann）到 W.E.B. 杜波伊斯（W.E.B. Dubois）再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深厚民主传统的能量凝聚起来。它不仅考察了在学校所发生的为民主而斗争的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证明了有必要把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作为仅存的为数不

多的公共空间来维护，在这里来实际地教民主，体验民主，以及保卫民主。与那种仅仅想训练劳动力的学校教育模式正相反对，《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构想着学校教育的更广阔的角色和任务，它认为无论从学校教育的目的还是从其教学的内容上来说，学校都必须从事批判的教育，认真考虑和对待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民主的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坚定地要求建筑实质性的民主、批判的行为和批判的教育之间的联系，而反对忽视或放松它们之间的联系。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逐渐上升的潮流，中国的教育者必须做出努力，把学习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建构批判的教育得以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场所，并批判地参与其中。必须意识到，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可以经受政治的争讼。必须建构政治、社会和文化斗争的决定性的场所，由以推进构成政治主体和社会能动者的知识、身份、感情投入和社会关系。只有这样一种政治主体和社会能动者，才能给全球民主赋予活力和扩展其基础。《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在今天比当初写作时更有意义了，因为它的持续的企图就是发展一种民主的政治和教育，把社会公正、平等、自由和权力的遗产与对历史、空间、多样性、权力、话语、身份、道德和未来的民主关注结合起来。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把教育完全看作一种伦理和政治实践。这种实践既指向旨在抵抗政治文化越来越非政治化以及学习的公司化和标准化的种种斗争，同时也是这种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不应该把教育与训练相混淆，而教学必须被看作是扩展学生不得不具有的理解和改变世界的能力的一种努力。教育是意识得以形成，需要得以建构，以及用于自我反省和社会改革的能力得以培育和成长的场所。教育在以下这些方面也具有难以想象的作用，它所形塑的语言、价值和意识形态，可能对支持全球资本主义的规则的各种机构和组织起合法化的作用。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在中国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与之相伴随的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拥抱。教育不只是一种技巧或方法，在中国，教育应该成为这样一种关键性的场所，那就是创造各种教学和政治的条件并为

之斗争的场所，它要提供种种可能性，让人民相信自己能够发挥种种形式的能动作用，使他们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以集体的形式都能参与实际的社会过程，正是通过这些社会过程，权力的物质性的关系决定着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和实践。在目前的历史背景下，权力斗争既采取物质性的和制度上的形式，也表现为象征性的和间接的形式。教育上的斗争，不只是意义和身份上的斗争；它也涉及意义、知识和价值怎样被生产、合法化，以及怎样在权力的、经济的、结构的关系内运作。教育与政治不矛盾；它是关于政治的任何定义中的重要、关键的因素，不只是为系统地批判极权主义提供理论工具，而且也提供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语言，用来为民主的社会变革创造实际的运动。这里利害攸关的是把以象征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益和有助于民主化的过程，与更广泛的社会情境和权力自身的制度形态结合起来。这里的关键点是根据有关教育和教学怎样与权力的更大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来理解和从事教育和教学的实践。教育者、学生和家长都需要更清楚地了解权力是怎样通过或者以文本、陈述和话语来发生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权力不能被局限在关于陈述和话语的研究上。改变意识与改变压迫的制度基础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没有意识深处的变革，那么，制度的改革同样不可能发生。意识的变革，具体来说，就是要认识到这种变革的真正必要性，或者，认识到有必要重新创造使这种变革成为可能的条件和实践。此外，对以下这些方面提问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教育与公民文化的关系，以及个体和社会群体凭什么有责任要正视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面临的主要社会难题。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认为，如果中国的学校教育要成为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即培养公民行使他们的自由，并有能力质问支配民主政治生活的基本假定，那么，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高等教育中的教师，都必须承担他们作为公民和学者的责任，采取批判的立场，使他们的工作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给学生提供知识并就紧迫的社会问题进行辩论和对话，提供条件让学生们满怀希望，并相信公民

生活至关重要，相信他们在形塑公民生活以及为所有的群体拓展公民生活的民主可能性上能够做出独特的贡献。这意味着中国的教育者需要表明立场，采取行动，尽可能地利用能够对不加区别地拥抱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的那些思想、价值和理论。无疑，今天中国的教育者面临令人难以想象的挑战，这就是创造新的话语、教学方法和集体斗争，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希望和工具，复活政治文化，以对民主的公共生活的死亡作出伦理的回应。这样一种挑战意味着持续的斗争，以使那些制度空间、论坛和公共领域保持活力，支持和捍卫批判的教育，帮助学生获得自己作为个体和社会能动者的权力，锻炼公民勇气，参与那些由社会负责的社区项目和研究，与此同时，拒绝出卖知识和技能给最高的竞买者。在某种程度上，这要求教学实践把语言、文化和身份的空间，与它们在更大的物理和社会空间中的部署联系起来。这样一种教学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之上，即，教学生打破已接受的思想是不够的。他们也必须学会直接面对来自各式各样的原教旨主义的威胁，面对这些原教旨主义对民主的威胁。

的确，有一些评论家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给学生提供一些劳动技能之外的东西，会影响他们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和生存。我也相信学校教育应该给学生装备各种技能以便进入劳动场所，但是，也应该教育他们抗争劳动场所的不平等，民主地构想劳动的组织形式，识别和挑战与自由、平等这些最基本的原则相矛盾、并削弱这些原则的各种不公正，尊重构成为全球公共领域的所有人。公立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不只是包括职业的准备，甚至也不只是批判意识的培养；它们也涉及构想不同的未来和政治，把它们看做是介入公共生活的一种形式。一种批判的教育应该要求中国的公民，能在私人的考虑和公共问题这两个不同的方面之间进行合理的转换，能够认识那些否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公正的反民主的力量，愿意反省他们自己的人生历程，把自己投身到世界的发展中去，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斗争。简而言之，应该成为公立学校教育和大学二者的首要关怀的，

是民主的价值，而不是商业的价值。

如果中国的公立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被新自由主义的原则所支配的话，那么，后果将是导致出现这样一种社会，受过良好训练的大量精英指挥着技术—信息革命，而广大技能低下的贫穷者和少数劳动者将只能从事服务性的劳动，这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显著特点。如果要不落入这样一种景象，那么，我们就不能把真正的、批判的教育与职业训练相混淆。如果中国的教育者，当然，也包括其他人，要防止这种混淆的情况出现，那么，就非常有必要挑战教育产业化，保证所有的年轻人都得到必要的保护，并获得必要的机会，把年轻人看做经济和道德投入的首要依据，为民主的未来树立希望。简而言之，教育者需要重新承担对未来世代的义务，认真对待新教神学家狄特里希·邦霍夫（Dietrich Bonhoeffer）的信念，即，无论对什么民主社会来说，道德状态的最终的检验，就是这个社会中孩子们的状态。如果中国的教育准备接受这样的道德承诺，那么，它不仅必须重建对年轻人的责任，而且必须行使它的作为民主的公共领域的角色。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强烈主张，在学校教育退化为职业训练和没完没了的检测，公立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屈从最高的市场竞买者的时代，最为重要的事情是，把学校教育教学看做是更广泛的民主事业的组成部分，给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资源，把他们自己看做批判的公民，能够积极地加入到理解和构成支配他们的生活的力量之中。我们必须记住，教育应该与一项具有内在合理性的乌托邦工程结合在一起，鼓励学生以及其他公民把自己重新概念化为批判的社会能动者，超越他们已知的世界，构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同时，努力斗争，使作为一种健康的民主文化和社会秩序之核心的组织和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和力量。

如果中国的教师要行使作为知识分子的作用，那么，他们就绝对有必要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把批判的要素与我所说的有教养的希望结合起来。希望，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个体和社会斗争的前提条件，意味着

在广阔的社会场域持续不断地实践批判性的教育,在希望面对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公民中恢复公民的勇气。在这种意义上,有教养的希望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与那些试图把希望变成一种新的标语口号,或者惩罚和放弃超越给定事物的地平线而探索新事物的努力的人不同,教育者需要复活一种抵抗和可能性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希望被看做是一种事业,也被看做是一种教学状态,用来提供一种对抗和卷入斗争的意识。作为一项事业,安德鲁·本雅明(Andrew Benjamin)坚持认为,必须把希望看做是“现在的一种结构状态,而不是关于未来的承诺,不是关于未来将必定总是怎么怎么好的不断的承诺”^[2]。不能把希望看做是一种个人的倾向,它对任何追逐民主的教育事业来说,都具有根本的意义,因而必须被看做是一种更广泛的政治的组成部分。这种政治承认目前使某些行为和民主政治成为可能的那些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就成为期望性的,而不是救世主式的,动员性的而不是治疗性的。对一种更人道的社会的渴望,并不是说要从世界中退却,而是通过批判和实践的参与从目前的行为、制度形态和日常实践中摆脱出来。在这种场合之下,希望并不忽视人类苦难、剥削和社会关系的比较坏的维度;相反,它承认需要维持“认识最坏的事物的能力,以及提供更多的东西来思考”^[3]。

因此,希望不只是一种政治,它也是一种教学的和执行性的实践,为使人们能够了解他们作为伦理的能动者和公民的潜能提供基础。希望是那些深深影响人们的记忆和生存经验的教学实践和斗争的结果,同时,它把个人的责任与关于社会变革的进步意识联结起来。作为乌托邦式渴望的一种形式,有教养的希望开启了比较的地平线,它比较的不只是不同的历史而且涉及不同的未来;同时,它总是对确定的东西提问,由此展现了矛盾的具体意义。正如保罗·利科所提出的,希望是“反对封闭的一种重要的武器资源”^[4]。有教养的希望赋予政治以多样性,为不同意见开辟空间,使权威成为需要说明的东西,在促进社会转变方面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

乌托邦想象目前的局限，尤其按照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传播情形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许多教育者，当然也包括其他人，未能构想出必要的教学条件，使能够扩展个人权利、社会正义和民主自由的政治能动作用成为现实。同时，希望的政治和教学既不是一张未来的蓝图，也不是社会工程的一种形式，而是一种信念，简单说来，不同的未来是可能的，坚持开放偶然性、情境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唯有通过教育的批判形式，人们才能了解现在的局限性，以及他们“把关于局限的一种勇敢的意识与关于可能性的一种崇高的远景结合起来”^[5]所必要的条件。

希望无论是作为一种伦理的概念还是一种执行性的实践，都对在深化社会正义和全球民主的可能性的更广泛的斗争中如何发挥社会能动作用提出了重要的挑战。这样一种立场得到了朱迪斯·巴特勒的共鸣，他说：“对我来说，当我们能够质疑那种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物，尤其是关于到底什么是人道的东西时，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会有更多的希望。”^[6]秉承广泛的批判性民主之诺言的任何教育事业，都必须认识到任何可行的政治和社会能动作用的概念的复活，都依赖于一种质疑的文化，而质疑的目的是“使永远不会枯竭和完结的人类潜能保持开放，抵抗阻碍人的可能性进一步展开以及预先竞买这种可能性的任何企图，推动社会接续对自身提出质疑，防止这种质疑什么时候停顿下来或者被宣布结束了”^[7]。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础上，即批判教育在以下这些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就是创造条件，创新知识和提高技能，使人们拥有希望而不是玩世不恭，对他们自己以及其他的人负责而不是让他们的能动的意识屈服于公司或者独裁主义的暴君，对他们的自我表现采取关键的步骤而不是模仿消费文化的指令，以及打破使他们迷恋新自由主义的“常识”和新的全球秩序的异化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与其说是宣布一种确定的政治的宣言，还不如说是调解和干预的一种形式，试图把教育者和其他积极的行动者与或

新或旧的斗争场所联结起来,努力深化和拓展民主的公共生活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出版,是为了去把握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同时,也为中国的教育者提供一种批判和可能性的语言,以利于他们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能够把教育与批判的能动作用联系起来,把学校教育自身与更广阔的公共考量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真诚地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找到各种各样的途径,把本书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来使用,重新思考民主的意义,思考教育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思考在一个反民主的独断论和市场独裁主义越来越猖獗的时代,重新考虑政治的本质和干预的方式,这可能意味着什么。这种政治和干预要能够把教育与一种新的民主事业结合起来。这种民主事业,既有追求社会公正的意识,同时也对人类苦难和剥削的存在怀有深深的敌意。

注 释

[1] 关于9·11以来布什施政方针的精彩分析,见 Paul Street, *Empire and Inequality: America and the World Since 9/11* (Boulder, CO: Paradigm Press, 2004).

[2] Andrew Benjamin, *Present Hope: Philosophy, Architecture, Juda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

[3] Thomas L. Dunn, "Political Theory for Losers," in Jason A. Frank and John Tambornino, eds. *Vocations of Politic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160.

[4] 转引自 Zygmunt Bauman,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8.

[5] Ron Aronson, "Hope After Hope?" *Social Research* 66:2 (Summer 1999), p.489.

[6] 转引自 Gary A. Olson and Lynn Worsham, "Changing the Subject: Judith Butler's Politics of Radical Resignification," *JAC* 20: 4 (2000), p.765.

[7] 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 *Conversations with Zygmunt Bauman*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1), p.4.

英 文 版 序

批判理论与希望的意义

彼得·麦克莱伦

亨利·吉鲁的具体教育学

IX

要

在如此短的篇幅里完成一幅有关亨利·吉鲁 (Henry Giroux) 的综合性的知识肖像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对于他的著作的范围和批判深度来说，任何评论，即使在乐观的条件下，也都很难做到公正。) 因此，这里只能做一种更谨慎的努力，仅仅强调吉鲁著作中的某些一般的方面。我想，如果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确定本书这些章节的理论背景来

说，这样做也就足够了。

在过去的十年中，吉鲁持续致力于探索具有理论、政治和教育意义的问题。他的著作的持续不断的影响，有效地摧毁了关于学校教育及其与更广阔的社会的关系的公认观念，这种观念把社会看作内部协调、各种因素之间相得益彰的统一整体。吉鲁反对那种把课堂教学和学习看作是一种与权力、历史和社会背景没有关系的中性的或透明的过程，而设法为关于学校教育的批判社会理论提供生产性的基础，这一理论向教育家、政治家、社会理论家和学生，等等，提出了独特的挑战。^[1]

吉鲁批判地借鉴社会理论中的新进展，提出了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在此基础上，有力地挑战了那种认为学校是形成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秩序的主要机制之一的权威假定。他关于教育领域中新保守主义复兴的分析，有助于揭露卓越运动（the excellence movement）一直借以掩饰其在平等和社会改革问题上的退步的逻辑。此外，他对进步论者的批评，揭露了自由派教育家中的多少已经被接受的实践——诸如，已制度化的分流（tracking）和按照工业的命令对课程进行结构化——削弱了真正的民主价值，而民主是自由的基础。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了解，保守派教育家和自由派教育家两者所强调的东西，是怎样被他们狂热拥护的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度，证明只不过是谎言而已，不平等和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他们一直坚守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吉鲁所成就的事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教育上，一直是要揭开社会的真面目：在社会秩序中相互竞争的自身利益之间，实际上总是存在着已经被结构化的不平等。他揭示了美国人通常使之与学校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公共事业，诸如，不论种族、阶级、信仰，或性别，所有个人的精英主义的权能发展，往往由组成公共事业体系的诸多矛盾所颠覆。总而言之，吉鲁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心要阻止在学校盛行的那些与培养学生成为积极的、批判的和敢于冒险的公

民这样一些目标不协调的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实践。把握和理解吉鲁的范围广阔的兴趣领域，已经成为一种持续的追求，一种正在形成的意向，这将对那些在追求教育成功之路上失败而被别人超越的人，对那些认为历史是残酷的，对历史不抱什么希望的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改变。这些人既包括对社会不满的和贫穷的群体，也包括那些因为具有特权性的阶级地位因而失去社会敏感性和无力对社会的平等和不公正采取反抗立场的人。

吉鲁的研究不只是表现在对批判教育理论的历史性贡献上。因为，他也形成了对当代学校教育的政治形式的高度原创性的解释，这一解释来自对批判教育理论的力量和不足的觉悟，来自对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和历史偶然性的敏锐的感受。吉鲁的研究虽然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理论博学，但是，仍然存在着能够且应该挑战和争论的余地，这将成为未来理论对话的组成部分。可以肯定，他的研究的某些方面也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的。不过，这里不是详细讨论如何对吉鲁的研究进行批评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更重要的应该是把他的研究当作一种批判思想的整体来研究，而批判思想必须被看做是教育斗争和政治权能发展这一未竟工程的组成部分。

虽然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吉鲁的研究还没有演变为重要的政治活动，但是，现在他的研究已经成为发展和推进批判教育理论的重要话语和基础。最近几年，吉鲁开始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理论领域，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这一新生的领域做了许多重要的贡献。^[2]吉鲁所从事的是一项跨越性的工程，出现在本书中的题材范围之广就是对这项工程的一个最好说明，可以把这项工程概述为系统阐述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的尝试，而批判教育学的使命是发展学生的权能，是为了更公正和合理的民主而改造更广泛的社会秩序。对吉鲁来说，核心的问题是发展一种语言，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人能借以阐明和理解学校教育中的关系，渗透和影响学校教育内部关系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学生带到学校中来的历史地建构起来的需求和权

能。如果教育者想要认识主流的学校文化与霸权性的实践有着怎样的牵连,那么,批判地把握学校教育中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霸权性的实践通常剥夺了由学生构成的从属性团体的话语权力,也使得教学生的教师越来越丧失教育学生的技能和权能。这样一种把握和理解也能提高教师与来自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的学生一起批判地工作的能力,这样,这些学生就能够认识到,主流的文化是怎样和为什么既鼓励他们共谋,同时又强化他们无权能的状态。当然,批判教育学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学生的权能,介入他们自己的自我形成,改变使这种自我介入成为必要的更广泛的社会压迫性特征。诸多文化派别对教育、文化和经济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吉鲁对这些派别的最终判断,尽管是诅咒性的,但是,并不排除进步性改变和变革的可能性。根据吉鲁的观点,人类能动者具有通过在物质世界之内、针对物质世界的集体斗争,以及通过发挥他们的社会想象力而重塑世界的能力。

XII

在吉鲁的著述中,有着一一种激情和义愤——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斗志昂扬的希望——这种情感和希望多少会有损传统学术工作的那种超然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以及流畅性。标示着吉鲁的批判声音的那种活力以及不时表露的蛮横,承载一种特殊的遗产,这一遗产既是一种愤怒,也是一种力量,它部分地来自于他年轻时在罗德岛(Rhode Island)工人阶级聚居区的成长过程中所经验的挫折以及所从事的反抗和斗争。吉鲁的经历也被20世纪60年代他作为社区组织者和做中学教师的7年参与的斗争所形塑。吉鲁经常把他所受的大学教育称之为历史性的灾难。如果不是篮球奖学金帮助把他从史密斯山(Smith Hill)的街角带到大学的讲演厅,他的生活无疑会发生不同而且不利的转变。^[3]阶级差别给吉鲁早年岁月打下深刻的印记。对阶级差别的亲身体验,以及他后来去理解学校教育给那些早就具有社会优越地位的人赋予特殊权力的方式的努力,给他的那些已经名满天下的著作带来追求公正和平等的激情。

吉鲁的研究给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批判语言,帮助他们把教学

理解为文化政治 (cultural politics) 的一种形式, 也就是, 理解为在意义和经验的生产和合法化的过程中认真对待由种族、阶级、性别和权力所构成的关系的一种教育事业。这样一种语言的意义, 能够由它如何谈论与建设批判性教育关系密切的问题和事情来判断。多少年来一直左右着吉鲁的思维和研究的一些问题和事情, 可以概述为如下一系列议题: 我们要以之为背景和依据来把我们自己建构成变革的社会能动者的道德变量是什么? 怎样才能把与阶级、种族、性别和权力相关的难题落实到教育的质量和卓越的问题上? 为了重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学生的身份和经验,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针对主流文化而重新定位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 教育工作者如何创立一项使批判形式的知识实践合法化的教育学项目? 怎样才能做到承认身份的差别和多样性而仍然能够谈论意志和政治斗争的问题? 在解放性教育的名义下, 我们会使什么样的多样性失去表达的权力? 教育工作者怎样才能真正认识到一直在所谓教育的名义下实行着的不公正? 他们怎样才能真正面对他们自己实际上是在参与一种压迫性制度的事业 (这种制度常常表现为掠夺学生的基本权利)? 教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支持一种旨在整体推进民主的公共文化的教育? 教育工作者怎样才能把学校教育的理论与一种身体和欲望的教育学 (a pedagogy of the body and desire) 联系起来? 知识/权力/主体性关系的范围是什么? 我们怎样来形成一种把权力和目的的语言, 与亲密、友谊和关心的语言整合起来的公共话语? 如果不对那些完全被统治或无知所掌控的人表示轻蔑, 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 那么, 我们怎么以解放的名义说话呢? 如果一直不尝试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在历史上什么是可能的。既然如此, 那么, 教育工作者怎样才能开始赋予学生以权能去构想他们自己的未来? 在那里, 学生的希望可以实现, 自由是可以梦想、争取并最终获得的。批判教育学从诸如此类的问题说起,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求今天的学生和教师以面临的现实和具体的问题为出发点。批判教育学所提出的问题——与人类的境况直接相关的、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被表